◆专家视点

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稳定

□韩庆祥 张 健

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公平正义充分彰显。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论断，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外媒称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刘云山同志强调：这个总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揭示了改革的方向，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相适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也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第一位要求。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促进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公平正义”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现代化的内涵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一般而言，现代化描述的是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商品时代）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

在农业时代，人类社会是通过“你种苹果，我种梨”的方式生存的，人的发展体现为“农民化”（农村里的人，种地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农业化”，社会交往平台集中在“自然村落”（即人们是因一定的血缘关系而聚在一起）。而随着“苹果和梨”种得越来越多，社会需求转变为“种苹果的想吃梨，种梨的想吃苹果”，历史开始进入“用苹果换梨”的阶段。这就是商品时代。该阶段，人的发展体现为“市民化”（城市里的人，市场中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工业化”，社会交往平台转换为“城市社区”（即人们是因同样的收入水平住一个小区）。可见，现代化缘起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体现为“农民—市民”“农业化—工业化”“自然村落—城市社区”三大核心框架的变革。

立足于中国，中央在1980年代提出了针对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1990—2000年，进入小康，解决温饱问题，在理论上，即是让“苹果和梨越来越多”；2000—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商品化的基础；2010—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即完成“种苹果和种梨——卖苹果和卖梨”转换。上述战略在政策设计上即为“小康社会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建设小康”向“建成小康”、从“改革启动——市场体制突破和完善”向“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转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炼出11个重大问题，设计了主攻方向、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同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和新目标。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定位

一般而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但是，从中央战略持续推进的角度看，三者之间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关系，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之所以这样，源于当前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发展路径。

从国情上看，当前我国存在两个数据：一是户籍农民9.5亿，占总人口的70%。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实现“种苹果种梨—卖苹果卖梨”转换，我们还有70%的人口没有做到；二是农村宅基地5.52亿亩，是城市社区的4.8倍。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完成“自然村落—城市社区”转换，我们还有4.8倍于城市社区的国土空间未实现转变。也就是说，从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及其现在的实现程度看，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那么，我们今天在哪里？1978年，中国启动农村改革；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二者构成了改革的启动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引进市场体制，实现了重要体制的突破；2002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对市场基本框架的完善工作。合起来看，1993—2013年，构成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体制突破和完善阶段。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表明，我们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某一方面的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先易后难的改革到攻坚期、深水区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性的改革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的改革。所以，改革启动（1978—1993）—改革的体制突破和完善（2003—2013）—改革的全面深化（2013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有的路径和脉络。这意味着，改革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或主要脉络。

发展缘何成为硬道理？源于我国的发展需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一，从发展需求看，1978年启动改革，要解决温饱问题。此时，中国社会蛋糕不大，其核心需求是要做大蛋糕。所以，一直到2002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止，中国一个时期内（1978—2002年）的基本需求都是“生产性”的，社会总体上处于进行“生产性努力”的阶段。2002年至今，虽然中国的“肚子问题”相对缓解，但是，在拥有70%农村人口和5.52亿亩农村宅基地的国情面前，中国依然要面对做大蛋糕的需求。一定意义上，中国发展依然是“生产性”偏重的状态，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和方法，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比较低的实际，明确强调，要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提供足够的“苹果和梨”，最终使其达到“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多”，从而推进社会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则现实需求，二则内在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当前我国国家发展的基本遵循。

稳定为什么是硬任务？一方面是由当前我国的“分配性诉求”决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共同富裕使然。体现在社会心态上就是，以前人们默默低头拉车，现在则是慢慢抬头，盯着蛋糕。如何把蛋糕分好？需要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基于一定认同的社会秩序建构，这种建构的核心要素有二个：一是平稳，二是协定。平稳，即动态的平衡；协定，即协商基础上的定规定制。合起来，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稳定。



价值目标 吴之如/画

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共同富裕，核心是指劳动者通过严密的政党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经济议程上体现为国有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控制。其基本逻辑是：私人资本具有两个本性，即利润嗜求和安全本能。利润嗜求，使得资本具有自私性和不正义性；安全本能，使得资本没有祖国。为克服资本的负面性，马克思提出国有资本理念，即通过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使得它既有祖国，又具有一定自律性。在这里，国有资本其背后的主体是劳动者，前台的手段是市场，外部的边界是国家，三者合一，既约束了私利，又保证了动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商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的核心是对资本的“私利性”的克服，因此在逻辑上，国有资本的核心特征是“共同体性”，反映在实践上，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不是为了少数人发展，因而该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不是为了个体性利益，因而该发展具有内在的协商诉求。合起来，共同富裕，既具有可持续性优势，又具有协商性诉求。因此，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发展追求“稳定”之特质（动态平衡+协商规制）。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诉求。

总而言之，改革发展稳定之关系，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形成了不同于其自身逻辑关联的新一层关系，即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层关系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框架。这一框架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如何稳定？

公平正义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关键

从理论上说，公平，核心是比例平等；正义，核心是绝对平等。比例平等，来源于A和B之间的下述关系：若A有能力，贡献100元价值，B能力一般，只能贡献10元价值，那么，社会该如何回报？如果确定“同一回报率”，则就是公平。在这里，“同一回报率”之所以最佳，是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激励能者，鞭策平者，使“蛋糕越来越大”，舍此相反。换言之，公平的起点是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假若社会仅仅推行公平政策，那么，A得的越来越多，B得的相对越来越少，则两极分化出现；若两极分化超出临界点，那么，社会可持续性就会中断。可见，公平原则具有边界，超出该边界，公平的功能就会走向反面。基于此，正义原则成为必须。

何为正义？这即“绝对平等”原则。其内涵是：随着公平的推进，A成为富人，B相对成为穷人。如何避免两极分化？需要测算穷人B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需要多少钱，假若测算得出需要50元，那么，国家就要无偿提供50元，既给B也给A，这就是绝对平等的含义，也即正义的基本逻辑。可见，正义原则针对的是如何避免两极分化、如何确保最穷的人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简言之，正义与社会“效率”无关，它解决的是可持续性问题。

综合而言，首先，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有效率，否则社会就没有蛋糕或者蛋糕越来越少，这决定了社会的首要逻辑是公平；其次，社会的发展的要旨在于永久持续，而公平本身无法提供可持续性支撑，因此，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要件。完整说，一个社会，第一要件是公平，有它才会有蛋糕或者才会不断做大蛋糕；第二要件是正义，有它才有可持续性，进而永久发展。

回到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着的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可以发现：

首先，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做大蛋糕而不再仅仅是做出蛋糕的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使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能带来效率的“公平原则”作为发展问题的前提。如何有效实践这一原则？理论上，需要三个宏观政策给予保证：合理的社会分配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监管；合适的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监控；动态可调的薪酬回报制度。

其次，当前中国，基于做大蛋糕基础上的诉求逐渐趋向于“分配性”，一定意义上，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这预示着我国的正义之不足，需要提供足够的正义资源以保持社会稳定。从国家角度看，需要对当前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摸底，这是制定有关正义政策的前提。理论上说，我们需要三个宏观政策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基础保障制度；社会基本福利制度；政府中的科、教、文、卫职能部门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质量。

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发展问题能否解决好，关键是公平原则是否到位和有效；稳定问题能否处理好，关键是正义原则是否转换为政策理念并被有效实施；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群众认同，关键在于改革能否体现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能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否解放和增强社会创新活力。而反过来，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既有利于使发展充满动力活力，也有利于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既利于健全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利于健全稳定的平衡机制。在这里，公平正义，使得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正因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是统领其他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其中，改革又是这一总问题的“牛鼻子”，它统领着发展与稳定。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由此，改革发展稳定尤其是改革，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科学对待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组织教师进行了集中学习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大家集中谈到一点，就是讲话在科学评价历史人物、郑重对待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方面，全面深刻，客观公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讲话在坚持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党的历史作了新的高度概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是对党的历史深入研究的结果，体现了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历史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历史决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在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功过的基础上，我们党根据实际和历史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作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同时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于他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所作的一次新的重申，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性和现实针对性。这与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论断，是一以贯之的。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评价，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要从它的历史形态去观察，一切都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懂得对立和统一的法则，对过去和今天进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分析。在新旧事物之间，既要看到它们的区别和矛盾，又要看到它们的联系和承续，忽略了任何一面，都将是对历史的背离和歪曲。

用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我们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人的活动是相互联系的，要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其次，要把历史人物放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既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又不苛求前人。再次，要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要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不应该概念化，并注意防止个人情绪和好恶的支配。在评价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时候，既要承认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要看到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比如，当时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成功经验可以遵循的现实境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外部环境、长期封建主义影响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都是造成失误和错误的重要客观因素。因此，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明确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也是我们进行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评价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应采取郑重的态度。

讲话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全面准确的判断。

事实正是如此。对于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并以之为鉴，体现了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郑重态度。

对于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同志本人在世时曾主动承担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自我批评，就几年来工作中的失误承担了直接的和间接的领导责任。他同时强调指出，有了错误，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些话，科学指明了对待真理和错误应有的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失误和错误，不断追求真理，就一定能得到群众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史为鉴，着眼于未来，更好前进。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更替的真实记录。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不能任人打扮。我国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和自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苦难与辉煌交织，光荣与梦想辉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座巨大而宝贵的精神宝库，蕴藏着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正能量。

领袖人物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但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著名的“窑洞对”，到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再到邓小平同志说“联产承包是农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群众创造的”，无一不深刻反映了这个真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观察，90多年来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以史为鉴，着眼于未来，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执笔人：李庆刚）

（上接第1版）

科社部原主任赵曜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得人心的几件事情，一是反腐败加大了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二是刹住了奢靡铺张浪费之风；三是从“八项规定”开始，出台不少刚性措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些举措令人振奋，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党史部原教授周文琪认为，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上牢牢抓住几个方面，扭住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不放，扭住纠正“四风”不放，形成了很强的震慑威力。过去说的四大危险，从一年多的实践看，党中央应对得很好。党中央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一关键，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有很大推进。

寄望加强制度建设 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有老教授认为，实现中国梦是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工作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为什么好？是因为中国梦能连接起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把党的历史和每一个人民群众连接起来。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美好梦想和美好愿望，因此中国梦还连接起了中国和世界，方便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中央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之际，用中国梦凝聚起民族和人民。而要实现中国梦，既要有先进的思想做指导，还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怎样把中央的改革举措落实好？老教授们认为，关键要靠制度建设。党建部原主任陈登才认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已经不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同融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去，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有进步，提出了反腐败的五年规划。包括巡视制度、中纪委的通报制度等，都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教务部原主任辛守良认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并在改革中强调了制度建设。制度以经验积累为基础，相对于理论来说是滞后的，经过这么多年实践，现在正是进行制度建设的好时机。抓住这一时机，就能使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有一个提升。

有老教授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构想要靠制度建设作保证。党的自身建设要靠制度建设来制约，党执政之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最大的考验是能否经得起权力的腐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八项规定”开始，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对党规党法的重新梳理和制定，都是在一点一点落实这些要求。

老同志们表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虽然年事已高，但能赶上快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时代，深感欣慰和自豪。一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发挥好余热。